

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

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

沈永宝 编



东方出版中心

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

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

沈永宝 编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

沈永宝 编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印张: 12.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283千字 插页2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印数: 1—3,000

ISBN 7-80627-288-7/I·111

定价: 20.00元

总序：现代人不应该遗忘什么？

陈思和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一共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新文学）里，新文学是与时代同步发生的文学现象，研究新文学也就是研究当时刚刚发生不久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作家也是新起的，并没有也需要对其作文物式的研究和发掘，所以，这一阶段里没有资料式的研究，当时出版的几种初步的新文学史著作或者文坛掌故之类的书籍，与其说是保存了新文学有价值的资料，还不如说是保存了当时文坛上的一些真实的信息。在第二阶段（现代文学）里，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在建立，但同时又笼罩在强烈的政治功利意识之下，“以论带史”，或者为了配合政治运动而不惜歪曲历史真相的做法成为很普遍的现象，于是也谈不上对文史资料的重视。举一个例子，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的丁景唐先生与人合作编成一部《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那时还没有到批判《多余的话》和砸烂墓碑的时候，可是要出版一部这样的书还是遇到重重困难，直到当时的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出面相助才得以问世，丁先生至今说起还对石西民部长怀有知遇之感。这种事现在孤立地看有些奇怪，其实再仔细想想也是见怪不怪的，那时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在整左翼文艺运动中的老战士，从胡风、丁玲、冯雪峰到“四条汉子”，哪里需要什么史料的真实？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现代文学的史料抢救工作仍然有

人在做,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当时为新文艺出版社)那时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丛书里影印的30年代革命文艺期刊,保存下大量的文学史资料。第三阶段(20世纪文学)里,文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出版才真正地形成蔚然大观,两套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各以几十种的规模陆续出版,为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我这一代在“文革”后逐步走上现代文学研究道路的人,大约都是深受其惠,而现代文学史料学也作为一门学术研究的类别而得到重视与发展。

我这是讲收集和保存研究资料对于学术研究的好处。现在学术思想比较自由,见解多歧,如果手里掌握了一些实在的东西,并由这实在的东西里产生出独立思考的学术成果,发表自己的观点时心里就比较踏实,骨头也会相应地硬一些;也有些相反的例子,有些青年学者敢于大胆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从理论上说也不错,但只是论据少了一些,或者在应用论据时出现了所谓的“硬伤”,不但不能以理服人,反而降低了可信度,这不能不说这是令人惋惜的事情。我自己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当初在大学里念书时,我和李辉合作写研究巴金的文章,最初写的是批判“四人帮”诬蔑巴金是无政府主义,我们的观点是认为巴金的著作里并没有什么无政府主义。文章写成后我们拿去请教贾植芳先生,贾先生问我们看的是什么书,我们说是通读了巴金的14卷文集。贾先生就告诉我们,研究一个作家不但要看他后来编定的文集,还要看他最初发表的著作版本,还应全面了解他的思想和写作情况,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又看了许多书,包括奥尔格·朗著的英文版《两个革命时期之间的中国青年——巴金和他的著作》,才慢慢弄清了巴金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曲折关系。后来我又参加了贾先生主编的《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

国的影响》一书的大型资料编辑工作，看了许多报刊杂志，才弄明白一些外来影响方面的情况。我那本《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写作就是得益于此。有了这些经验，我是深深感到资料准确性的重要，有时写一篇文章翻来复去地拿不定主意，倒不是忌讳观点上的标新立异，只是怕运用的资料上出现“硬伤”。

有一种观点认为，学术研究可以分作两种人，一种是专搞资料搜集和整理的人，一种是专搞理论开拓、宏观研究的人；前一种需要小心翼翼，后一种人可以大大咧咧。前一种人只顾发现资料，后一种人可以利用前一种人的成果来创立新见，仿佛传说中的狼与狈一样。我没有实验过这样说法对与不对，不过依我看来，一个真正有思想的学者，正确的学术思想可能会偶然地来自触类旁通的理论启发或者灵感，但更多的是来自实实在在的资料研究，没有第一手的资料研究，就不可能产生出真正有骨有血的思想，因此，我总是建议青年学者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第一步，不必探头探脑地去抄什么新观点，应该先扎扎实实地将研究领域的资料搜集清楚，然后再来进一步讨论学术观点。出于这一学术目的，我非常赞成东方出版中心编辑这套“20世纪文学备忘录”的丛书，主张让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来编辑有关资料，并写出独特心得的研究文章，使资料搜集与理论研究相得益彰。陈厚诚先生写作《李金发传》的同时，编辑了这本“诗怪”李金发的回忆文字——《李金发回忆录》，这是第一次在大陆问世的著作；张业松先生从研究胡风文艺思想转向研究路翎，他搜集了大量佚失的路翎文稿以及在路翎家属的支持下认真整理和抄录路翎晚年创作的未刊稿，对路翎的创作作出了新的解释，他先后编出《路翎文论集》和收在这套丛书里的《路翎晚年作品集》，认真的读者都能从中体会出编者严肃的工作态度和高水平的学术品质；沈永宝先生长期研究五四初期的新文学思想来源，

提出过许多足以改变文学史既定结论的新观点，这次由他着手整理五四文学革命健将钱玄同的文集，搜集出大量有价值的文献，同时他还写出了三万字的研究文章。这些研究成果不但从史料上填补了 20 世纪文学史的研究空白，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上，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我推荐这套丛书还有别一番意义。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上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规律给文学出版物带来了近 50 年来最有活力的前景，但同时，虚浮的出版风气也是愈演愈烈，表面上的出版繁荣并不能掩盖人文精神的真正缺失。以现代文学的选本为例，大量充斥图书市场的文学读物，翻来复去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几部书，不但以泡沫现象掩盖了现代文学的本相，而且使本来有价值的作品也变成了现代流行读物，歪曲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真精神。这套“备忘录”的又一价值就是它决不是那种玩魔方似的翻花样赚读者的钱，它的编辑原则是以原创为宗旨，每一本都是从民族的遗忘中发掘出真正闪光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每一本的编辑都是开拓一片新的研究领域，来推动这个学科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发展。

这几年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低谷，以专门发表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刊物计，也只剩下了《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新文学史料》，前者发表研究论文，后者发表史料，都有点顾此失彼的样子。现在这套丛书的出版，似乎可以综合两家之长，为 20 世纪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用武之地。所以我希望这一辑四种书的出版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中国 20 世纪的文化历史上，有许多沉重的东西实在是不应该被现代人所遗忘的。

1997 年 3 月 6 日于黑水斋

内 容 提 要

“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旨在发掘本世纪文学史上被遗忘的精神珍宝。丛书注重原创性，较多收录了未曾在中国内地以专著形式出版过，甚至从未发表过的作品。

本书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钱玄同的第一部文集，收录了钱玄同五四时期有关文学革命主张以及文字改革方面的文章百余篇，多是与新文化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的对话，对于白话文、新式标点、直行改横行、汉字简化等问题提出了态度鲜明的主张。本书不仅反映了钱玄同个人在国学和西学方面的深刻见解和他的思想对于中国现代汉语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也可以说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幅历史画卷。

目 录

总序：现代人不应该遗忘什么？	陈思和
致陈独秀(1917年2月1日)	1
致陈独秀(1917年2月25日)	3
致陈独秀(1917年5月15日)	10
致陈独秀(1917年6月1日)	14
致陈独秀(1917年7月1日)	20
致陈独秀(1917年8月1日)	24
致胡适(1917年7月2日)	31
致刘半农(1917年11月21日)	38
《尝试集》序	43
致陶孟和(1918年1月13日)	49
致胡适(1918年1月15日)	54

《天明》译本附识	56
致沈兼士(1918年2月15日)	58
林玉堂信跋(1918年3月13日).....	60
致孙国璋(1918年3月13日)	61
致陈独秀(1918年3月4日)	63
文学革命之反响	70
胡适、张厚载信跋(1918年6月15日) ...	76
基督徒悔信跋(1918年3月21日)	77
致芝园(1918年7月1日)	79
戴主一信跋(1918年7月1日)	81
随感录(十六、十七、十八).....	82
致朱经农、任鸿隽(1918年8月15日) ...	85
致刘半农(1918年8月8日)	87
区声白、陶履恭信跋(1918年8月15日)...	89
孙国璋、陈独秀信跋(1918年8月15日)...	91
朱我农、胡适信跋(1918年8月15日) ...	93
随感录(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	
三十二)	95
致胡适(1918年10月6日)	99
张厚载致《新青年》记者信跋(1918年	
10月8日)	106
致鲁迅(1918年11月15日)	107
吴稚晖、张效敏信跋(1918年	
11月15日)	109
胡天月信跋(1918年11月15日)	110

姚寄人信跋(1918年11月15日)	112
张月镰致《新青年》诸君信跋(1918年	
11月15日)	115
致周作人(1918年11月6日)	117
致鲁迅(1918年12月11日)	118
致孙少荆(1918年11月15日)	122
致鲁迅、周作人(1918年12月25日) ..	125
致鲁迅(1919年1月4日)	126
致声白(1919年1月9日)	128
致矩猷(1919年1月9日)	130
宋云彬信跋(1919年1月9日)	133
《恭贺新禧》附记	135
随感录(四十四、四十五)	138
陈望道致《新青年》诸子信跋(1919年	
1月9日)	141
致鲁迅(1919年1月26日)	143
致鲁迅、周作人(1919年1月31日)	144
致鲁迅、周作人(1919年1月31日)	146
致时敏(1919年2月4日)	148
致周作人(1919年2月8日)	150
致凌霜(1919年2月10日)	152
彝铭氏致《新青年》记者信跋(1919年	
2月10日)	154
致周作人(1919年2月14日)	156
致时敏(1919年2月14日)	158

致周作人(1919年2月14日)	159
随感录(五十、五十一、五十五)	160
致公展(1919年9月22日)	165
致步陶(1919年10月24日)	170
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	173
陈懋治、胡适信跋(1919年10月24日)…	181
致陈大齐(1919年11月1日)	185
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	188
致周作人(1920年3月18日)	195
致周作人(1920年5月1日)	197
致鲁迅、周作人(1920年5月7日)	199
致周作人(1920年5月21日)	201
致周作人(1920年8月24日)	203
致周作人(1920年9月20日)	206
致周作人(1920年11月28日)	209
致周作人(1920年12月16日)	211
致周作人(1920年12月17日)	213
致鲁迅、周作人(1921年1月11日)	215
致周作人(1921年6月12日)	218
致周作人(1922年3月24日)	220
刘复《国语问题中的一个大争点》附记…	222
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两个重要的 议案	223
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	
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	

汉字革命	234
“汉字改革号”胡适“卷头语”附记	255
致周作人(1922年9月30日)	256
致周作人(1922年10月19日)	259
国文的进化	262
致黎锦晖(1922年11月20日)	265
致周作人(1922年12月27日)	269
“出人意表之外”的事	271
致周作人(1923年7月1日)	275
致周作人(1923年7月17日)	278
致周作人(1923年8月19日)	281
汉字革命与国故	284
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升迁之喜	
并祝进步	288
随感录	293
(一) 不通的外行话	
(二) 清室溥仪	
(三) “清君侧”	
(四) 《尚书》和《易经》为祟	
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	296
废话	308
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的后面	324
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	332
回语堂的信(1925年4月13日)	336
关于反抗帝国主义	343

致周作人(1925年6月25日)	349
敬答穆木天先生(1925年6月28日) ...	353
致周作人(1925年12月19日).....	360
致周作人(1926年3月14日)	368
致刘半农(1926年6月27日)	370
致周作人(1932年4月8日)	372
亡友刘半农先生	376
致王森然(1935年8月28日)	379
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381
 后记	沈永宝 387

致陈独秀

(1917年2月1日)

独秀先生左右：

顷见六号^①《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公前疑其所谓文法之结构为讲求 Grammar^②，今知其为修辞学，当亦深以为然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日前见公所拟大学文科中国文学门课程表，似以魏晋至唐宋为第二期，元明清为第三期。鄙意宋世文学，实为启后，非是承前。词开曲先，固不待言，即欧苏之文，实启归方。其与昌黎柳州，谅为貌同而心异。又如说理之文，以语录为大宗。以白话说理，尤前此所无。小说是近世文学中之杰构，亦自宋始。（以前小说如虞初世说，为野史而非文学作品。唐代小说，描画淫亵，称道鬼怪，乃轻薄文人浮艳之作，与纪昀蒲松龄所著相同，于

① 此说有误，应为《新青年》2卷5号。

② 语法。

文学上实无大价值，断不能与《水浒》《红楼》^①《儒林外史》诸书相提并论也。)故鄙意中国文学，当以自魏至唐为一期，自宋至清为一期。质之高明，以为然否？(后略)^②

钱玄同上言

《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日

① 即《水浒传》、《红楼梦》。

② 此处“(后略)”系原文所略。

致陈独秀

(1917年2月25日)

独秀先生鉴：

胡适之君之《文学改良刍议》，其陈义之精美，前已为公言之矣。兹反复细读，窃有私见数端，愿与公商榷之。倘得借杂志余幅，以就教于胡君，尤所私幸。

胡君“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尝谓齐梁以前之文学，如诗经、楚辞，及汉魏之歌诗、乐府等，从无用典者。（古代文学，白描体外，只有比兴。比兴之体，当与胡君所谓“广义之典”为同类，与后世以表象之语直代实事者迥异。）短如箜篌引。（文为“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长如焦仲卿妻诗，皆纯为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诗者之情感，诗中人之状况，皆如一一活现于纸上。焦仲卿妻诗，尤与白话之体无殊，至今已越千七百年，读之，犹如作诗之人与我面谈。此等优美文学，岂后世用典者所能梦见。（后世如杜甫、白居易之“写实体”亦皆具此优美。然如《长恨歌》中，杂用“小玉”、“双成”二典，便觉可厌。）自后世文人无铸造新词之材，乃力竞趋于用典，以欺世人，不学者从而震惊之。以渊博相称誉，于是习非成是，一若文不用典，即为俭学之征，此实文学窳败之一大原